

人文书托邦

# 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欧阳景根 译

人文书托邦

# 流动的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

欧阳景根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流动的现代性 / (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 欧阳景根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0-25263-6

I. ①流… II. ①齐… ②欧…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7331 号

## 流动的现代性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

欧阳景根 译

Liudong de Xiandaixi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62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7 000 定 价 5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录

2012年版序 再论流动的现代性	1
前言 论轻灵和流动	21
第一章 解放	45
第二章 个体性	101
第三章 时间 / 空间	159
第四章 劳动	219
第五章 共同体	277
补论 论写作, 论写作社会学	329

2012 年版序

# 再论流动的现代性



当十多年前我试图分析“流动性”这一隐喻应用于当今生活形态的意义之际，其中一个让我久久挥之不去和坚决抗拒揭开神秘面纱的谜团，是流动 - 现代的人类状况之地位：它是行将到来的事物的一种宣告、一个雏形、一个凶兆还是一种征象？或者毋宁说，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转瞬即逝的——也是未竟的、不完整的、不一致的——过渡性安排，一个介于两种应对人类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之挑战的截然不同却又可行、持久、完整、一致的答案之间的过渡地带？

迄今为止，我对解开这一谜团还毫无进展。不过，我还是日趋倾向于这样推测：我们现今发觉自己还处于“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处理事情的老办法不再奏效，过去习得和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和更加适合于新情况的新生活方式又尚未发现、就位和发挥作用……我们还不清楚现存的哪种方式和背景需被“液化”与替代，尽管没有一种方式和背景似乎可以免于批评，尽管（几乎）所有方式都曾在某一时刻被打上了待弃标记。

最为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先辈们不同，对于我们正欲抵达的“目的地”，我们缺乏清晰的认识，而对这种图景的认识，必将成为

oiii

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管辖权的一个模型……相反，对于最近这个大麻烦，我们却只能在黑暗中试验和摸索。通过关闭火力发电厂并代之以核电站我们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污染，只是又使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泄漏幽灵再度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已经感觉而非知晓（只是我们许多人拒绝承认），能力（即做事情的能力）已经远离政治（即决定必须做哪些事、先做哪些事的能力），而且我们除了对要“做什么事情”感到困惑之外，现在还对“谁应去做这些事情”感到迷茫，对此我们同样只是感觉而非知晓。考虑到我们所面临问题在范围、成因及结果诸方面的全球性，先辈们传给我们执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专门机构既受到民族-国家边界的束缚，而且数量也明显不足……

我们当然一如从前那样现代。不过，这些现代的“我们”近年来在数量上却有了惊人的增长。我们完全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每一个部分或者几乎每一个部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变为现代人。这也意味着今天与一二十年前不同，这个星球的每一片土地，除了鲜有的几个例外，都在顺应一场现今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并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包括持续扩大的人口过剩和它必将导致的社会紧张。

现代生活方式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恰恰是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以及持续变化的倾向。成为“现代”意思是指急切地、强迫性地去进行现代化；不只是“成为”，更别谈使其身份保持不变，而且是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避免完成，保持未定状态。旧结构一被宣告落伍或一过



有效期就失效，取而代之的每一个新结构，都只是另一次被承认为暂时性的、“有待进一步通知”的短暂安排。在任何阶段和任何时间，一直处于“事后”（post-something）状态这也是现代性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随着时间流逝，“现代性”以传奇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sup>①</sup>的方式变换着自己的形态……前些时间被（错误地）称为“后现代性”而我则更加切中要害地称之为“流动现代性”的东西，是对变化就是恒久而不确定性就是确定性的更大确信。一百年前“成为现代”意指追求“最终的完美状态”——现在却是指永无休止的改进，既没有“终极状态”也别无所求。

ix

无论是早些时候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固定性 vs. 流动性”之难题是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我把这两种状态视为一对由辩证关联性联结在一起的不可分离的组合（当利奥塔研究指出，如果人们没有先成为后现代就不可能成为现代之时，可能他心里所指的那种关联性……）。毕竟，正是对事物和状态固定性的追求，通常引起、维持和指引着液化；流动性并非一个对手而只是追求固定性引发的效应，它并没有其他的家族渊源，甚至（即使）它的家族都可能拒绝承认这一子孙后代的正统性。相应地，正是其渗流、渗漏和流动的变动不居状态在推动着冷却、阻尼、铸模的诸种努力。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将现代性区分为“固态的”和“流动的”两个阶段的话（即是指，按连续性的次序来安排它们），那么就是这种努力背后或隐或显的目的之变化。

瓦解传统最初并非因为对传统的怨愤，而是由于对现存和沿

<sup>①</sup> 普罗透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具有预言能力，但只向逮到他的人预言未来。他会变换各种形状以逃避回答问题。——译注

袭下来的传统之固化程度的不满：简单纯粹地说，根据痴迷秩序和强迫建构秩序的现代权力标准，馈赠的传统并不足够固化（不足以抗拒和免除变革）。然而随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传统就开始被视为是短暂的，液态岩浆冷凝成了“有待进一步通知”的形态，暂时性的安排取代了最终的解决。灵活性也已经取代固定性成了事物和事情要追求的理想状态。所有传统（包括那些暂时可欲的传统）只有在需要瓦解之时还能有望保持易于瓦解和服从瓦解的状态才能得到容忍。甚至在将一个持久结构进行安装、加固和固化之前，我们就必须充分掌握一种能将其再度瓦解的技术。必须在建筑结构的工作认真开始之前，就对拆解固定结构的权利和能力提供可靠保障。能充分“生物降解”的、开始对其聚合时刻进行分解的结构，现在才是理想的结构，而且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多数结构，现在必须努力去迎合这一标准。

简而言之，如果在“固态的”阶段现代性的核心是对未来的控制和固定，那么在“流动的”阶段其首要关注就变成了确保未来不被抵押，并且防范别人对机会进行任何先下手为强的利用，而这些机会是未来希望要带来并注定要带来的机会，是依然没有公开、既不为人所知也不可知晓的机会。在对这种人类状况的期望中，尼采的代言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悲叹“现今时刻的阴魂不散”，而这种阴魂不散的现今时刻又威胁要使身背过去成就与罪恶沉重负担的强力意志（Will）气得咬牙切齿，抱怨消沉，并被其重量压得粉碎……担忧事物因过于固定而无法被取消，担忧事物超过了它们的受欢迎期限，担忧事物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担忧因

为他犯下希望抓住美好时刻而使之化为永恒这一错误而跟随浮士德 (Faustus)<sup>①</sup>下地狱，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sup>②</sup>把所有这些担忧都追溯为我们对接触黏滑的或半流体物质之发自内心的、毫无准备的、与生俱来的仇恨；然而有代表意义的是，这种担忧只是被确定为流动现代性时代到来之际人类历史的最初提出者。实际上，这种担忧昭示着现代性的即将到来，而且我们可以把它的出现视为完全真正具有范式意义的历史分水岭……

当然，正如我已多次表明的，现代性整体因其强迫的、急切的现代化而从之前的时代凸显出来——而且现代化意味着液化、溶解和熔炼。不过——不过！最初，与其说现代智力主要着迷于熔炼技术（大多数明显的固态结构因其本身无法被提取出来而需被溶解），还不如说着迷于设计将被熔化金属倾注于其中的模具以及使之保持这种形态的技术。现代智力追求的是完美——而且它希望实现的完美状态最终意指的是紧张和辛勤工作的结束，因为下一步的一切变化只能变得越来越糟。在早期，改变被视为初步的、临时性的措施，寄望于它的是能带来一个稳定祥和的时代——因而还给人们带来舒适与悠闲。在从旧的、锈迹斑斑的、部分腐烂的、支离破碎的，并因而不可依靠和劣质的结构、框架和安排，向定制的、终极的完美替代品（防风、防水，而且事实上还防历史）转变的时代中，改变被视为仅限于这一时代的必需品。这也即是说，改变是一场迈向壮丽景象指日可待的运动。这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景象，或者

① 浮士德是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在其戏剧代表作《浮士德》中刻画的主人公。——译注

② 萨特 (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他拒绝接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存在与虚无》。——译注

是（回想起塔尔科特·帕森斯对现代追求的精妙概括）一个“自我平衡的系统”，这一系统能够从每一个想象得到的紊乱中胜出，并顽强地、不可改变地回归其既定状态。这是一种源自彻底的、不可改变的“概率不对称”的秩序（一些事情的概率最大化，而其他事情的可能性却最小化）。同样，因为秩序建构者的突发事件、偶然性、熔炉、模糊性、模棱两可、流动性以及其他祸根与梦魇，改变也被视为一个暂时使人心烦的事物（并被这样处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改变并非为了其本身的缘故而进行（今天大概是另外一种方式，正如理查德·塞纳特评论的，完美可行的组织现在已被从中破坏，只是为了证明它们具有持久的可行性）。

19世纪经济学家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见解是，预测经济增长将一直持续到“人类的所有需要都得到满足的时候”，然后不再增长——然后被一种“稳定的经济”取而代之，年复一年地再生产着相同的东西和数量。“与差异共存”的问题也被视为暂时的不适：这个令人困惑、色彩斑斓并因为差异间的碰撞和对立物之间明显不可调和的斗争而一直紊乱脱节的世界，终将回归和平、一致、单一并因彻底消除了冲突与对抗而没有阶级之分的一片祥和之中，是在一场“终止一切战争的（革命性）战争”的帮助下，或者说在（进步性的）调适与同化的帮助下，才彻底消除了冲突与对抗。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两位来自莱茵的热切年轻人，满怀敬意地注视着资本主义熔炉而进行着一种要把我们引领到那种稳定的、没有麻烦的社会就必须进行的瓦解传统的工作。波

德莱尔 (Baudelaire) 将他所欣赏的盖伊斯 (Constantin Guys)<sup>①</sup> 赞扬为“现代生活的画师” (painter of modern life), 因为他在须臾之间洞察到了永恒。简而言之, 自那时起现代化就是一条从始至终预先设定好了行进路线的道路, 是一场注定一切会好起来的行进之旅。

缺少了强制的和急切的现代化的现代性就如不吹的风或者不流的河一样都只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而已, 要发现或判定这一点还真的要花点时间……现代生活方式的主要任务已经从瓦解并不那么顽固的落后传统转变为瓦解因其过于顽固而变得并不可行的传统。也许从一开始它就在进行这类工作 (在事实发生后, 我们变得聪明起来, 相信事情确实如此) ——不过, 如果在詹姆斯·密尔、波德莱尔或者《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处的时代要向他们证明这一事实, 那么它的代言人将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当爱德华·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sup>②</sup> 在 20 世纪前夕大胆主张“运动就是一切, 目的微不足道”时, 他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筹建委员会的同声谴责, 并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高主席团 (Socialist Establishment's Areopagus) 开除。尽管波德莱尔和马里内蒂 (Marinetti)<sup>③</sup> 明显关注同一主题, 但在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价值论上的根本分歧并且这种分歧长达数十年……

现代性是因持久性事物分裂和短暂填补这一真空的恐怖征兆和前景而触发的。不过几乎在两个世纪之后, 持久性 / 短暂性之间的

① 盖伊斯 (1802—1892), 荷兰裔克里米亚战地记者, 水彩画家, 常为英国和法国一些报纸创作插图。——译注

②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 进化社会主义 (改良主义) 的建立者之一。——译注

③ 马里内蒂 (1876—1944), 意大利诗人、编辑、文艺理论家, 未来主义运动的创始人, 代表作为 1909 年出版的《未来主义宣言》。——译注

价值优劣关系发生了反转。在这个激烈的转向中，现在是轻便灵巧的设施可以进行转身，并处理和放弃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与之伴生的还有，纽带变得易于断开，义务易于取消，游戏规则的生命不会超过游戏进行的时间，有时甚至还短于游戏进行的时间。我们都被抛入一场不可停止的猎奇运动之中。

正如马丁·杰伊 (Martin Jay) 坚持认为的，“流动现代性”的降临根本不是全球同步发生的。在这个星球的不同地方，向现代性的“流动阶段”过渡就如历史中的任何过渡一样，不但发生的时间不同，而且进行的步调也不相同。至关重要的是，每一次它都发生在不同的背景中——因而在已经完成过渡的博弈者的全球景象中流动现代性的完全出现，就已经排除了复制和重复过渡路线的任何可能（我会建议“后来者”总体上缩短和压缩模式设定者的行进路线，只是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充满血腥的结果）。中国当前正全神贯注于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挑战，众所周知，这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错位、动荡和不满，并导致相当的社会分化。原始积累并非一种适宜于任何类型自由的情境——无论是生产者的自由还是消费者的自由。采取哪条路线都势必使它的牺牲品受到冲击并波及其他受害者，而且可能会引发爆炸性的矛盾，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和商人将在强大、无情的国家独裁统治帮助下，不得不对此进行压制。除了他们担任职位的名称之外，智利的皮诺切特、韩国的李承晚、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介石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十足的独裁者（亚里士多德把这类人称为僭主）；不过他们都统领了一场市场力量扩张和快速崛起的杰出运动。如果这些地方不是因为独裁统治持续

时间较久，那么它们今天都不能被称为“经济奇迹”的典范。而且还可以补充一点，它们成为这种典范，以及它们现在都摩肩接踵地全神贯注于追求一种精细的、“流动现代”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绝非巧合。让我再补充一点，战后日本和德国更早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外国军队占领来得到解释，这些外国占领军从国家政治机构中接管了国家的强制和镇压权力，而同时又有效避免了被占国家民主制度的任何控制。

简而言之，如果为启蒙运动所设想和为马克思所需求与期许之自由是根据“理想生产者”的标准来制造的，那么有利于推动市场的那种自由在理念上就是为“理想消费者”而设计的。这两类自由没有哪种比另一种更加真实、更加符合现实或更加可行——它们之不同是因为把注意力放在了自由的不同因素之上：用以赛亚·伯林的概念来说，就是消极自由（免于……的自由）与积极自由（做……的自由）的不同。这两种自由都把自由作为“使人有能力”（enabling）的条件，一种增强主体能力的条件——不过，是使他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并扩展哪种能力呢？一旦你认真地试图使这些问题接受经验审查，你将必然发现，生产者取向和消费者取向的这两种自由都预示着一种阻碍它们在实践中实施的强大不利条件，而且这种不利条件也是这种自由所预示计划的一部分。相反让人困惑的是，那些“使人无能力”（disabling）的因素却被认为就是使“能力”付诸实施的计划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择一弃一的做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并且注定失败。

不过这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而非一个形而上学的话题。一种

理想的没有缺陷的自由，一种使人有能力而不会使人无能力的“完全的自由”在形而上学上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就如社会生活中不可达到的目标一样；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因为这一事实——作为一种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强力推行自由就只能是一种分裂性的力量，而且任何具体运用这种自由的做法都将遭遇根本挑战。就如同许多理想和价值一样，自由永无休止地处于萌芽状态，永远不会实现（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并且一直是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因此在被称为历史的永不休止的实验中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

我们境况的“流动性”首先是因被简称为“解除规制”的东西引起的，即能力（这即是指做事情的能力）与政治（指决定哪件事应该被做的能力）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机构的缺位与软弱，或者换句话说说是完成任务的工具之不足；并且在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密切网络整合而成的星球上，还因行动上的“多中心主义”所致。直率地说，在“流动性”的状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这样就导致了不确定性，同时还导致了无知感（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无力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以及一种难以捉摸和四处弥散的、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一种没有靠山却绝望地寻找靠山的担忧。生活在流动现代性的条件下比得上在危机四伏的雷区行走：每个人都知道爆炸可能在任一时刻任一地点发生，但却没人知道这一时刻何时到来这一地点又在何处。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其结果没人能够免除，也没人能够确保幸免。当地引起的爆炸声在世界各



地回响。为了摆脱这种局面，需要做很多事情，不过毫无疑问，能力与政治在分道扬镳之后破镜重圆再度携手，就是今天人们想要“重新固定化”的必要条件。

自本书第一版以来另一个日趋明显的问题是，移民、难民、流亡者、寻求避难者等无家可归的人的数量在不可阻挡地攀升：这是一些在一直漂泊、居无定所的人们。达莱马这位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主席在2011年5月10日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与“欧洲两位最活跃的放火狂”贝卢斯科尼和萨科齐直接辩论时曾坦率声明：“欧洲需要移民。”支持这一假定的统计数字几乎再简单不过：今天欧洲有3.33亿人，但是现在（而且在持续下降）的平均出生率意味着在未来40年欧洲人口将缩减至2.42亿人。为了填补空白，至少需要3000万外来移民——不然的话，我们欧洲的经济将崩溃，我们所珍视的生活水平也将下滑。达莱马得出结论说：“移民是一种财富而非危险。”文化交融的过程也是这样，外来者的涌入必将引起文化交融；文化灵感的融合是丰富文化的源泉与创造力的引擎——对欧洲文明和其他任何文明都完全一样。尽管如此，在丰富文化与文化认同的损失之间仍然需要稍稍区分对待；为了防止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共处对文化遗产造成损害，因此共处需要以尊重欧洲“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关键是，双方都必须恪守这一原则！

然而，如果对“新欧洲人”的社会和公民权利的承认如此吝啬和犹豫，而且进展又如此迟缓，那么这种尊重又如何能够得到保证？比如说，移民为今天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11%的贡